

面向 21 世纪 课 程 教 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20 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

曾繁仁 主编

姜桂栩 郭继德 副主编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林 张志庆 姜桂栩

郭继德 顾蕴璞 曾繁仁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简介

20世纪欧美文学新作迭出，流派纷呈，由此引发的文学争论也是尖锐激烈，众说纷纭。本书精心选取了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43个热点问题，分别设为专题，对其产生的背景、问题争论的焦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归纳和评说。该书在每一专题文前设有内容提要，是作者对热点问题画龙点睛的理论阐述；文后附有参考文献书目和参考文献节选，是对一些代表性论著的辑录和节选。全书资料选取典型，内容丰富，观点多元，评说简约公允。本书可作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学习研究欧美文学的教材，也可作外国文学学者教学科研的案头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曾繁仁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
ISBN 7-04-010685-X

I. 20... II. 曾...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欧洲②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美洲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8133 号

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

曾繁仁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09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传 真 010-64014048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35.75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60 000

定 价 40.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	---

上 编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9
20世纪现实主义的评价之争	36
是“后期现代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之后”	53
关于象征主义诗歌的论争	67
表现主义的“表现”	79
“意识流”小说的名与实	88
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03
荒诞派戏剧的评价问题	112
“新小说”之新	129
英国“愤怒的青年”作家群	140
“垮掉派”文学与杰克·凯鲁亚克	149
关于“战壕真实派”的争论	154
苏联的“解冻文学”	166
黑色幽默与约瑟夫·海勒	192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与文学	203
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215
苏联“回归文学”述评	226
加拿大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差异	246

下 编

康拉德与《吉姆爷》	263
关于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	273
斯特林堡的“梦魇”	289
梅特林克及其“静剧”	297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306
艾略特与《荒原》	315
叶赛宁之争	326

卡夫卡的“归属”问题.....	343
茨威格的心理描写	354
劳伦斯作品中的性描写	368
《太阳照样升起》：“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书	375
尤金·奥尼尔与道家思想	384
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	397
关于萨特及其作品的论争	403
克劳德·西蒙的“叙述历险”	417
多丽斯·莱辛与《金色笔记》	428
肖洛霍夫及其主要作品的争论	442
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460
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评价.....	476
略萨小说的结构艺术	495
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501
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小说四部曲	510
米兰·昆德拉的探索	520
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社会主题	536
《小世界》的多重解读	550
后记	566

导　　言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世纪，也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变的世纪；是人类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也是人类蒙受空前灾难的世纪。政治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进而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在20世纪经历了由明显到隐蔽的过程。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导致在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而社会主义在20世纪也经历了由萌芽、兴盛到曲折发展的历程。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出现了一个同资本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1991年的苏联东欧巨变，又使社会主义走上曲折的道路，世界格局由冷战走向多极。20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经历了由电气和原子能时代到自动化和电子技术时代，再到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时代的巨变。正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许多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发展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的形态呈现，从而导致一百年内出现多次经济危机。

与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经济的多元发展相伴相生，20世纪的欧美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复杂多变、新潮迭出的状态，出现了数量众多、蔚为壮观的哲学、社会思潮。诸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为开端，20世纪的欧美文化精神发生了裂变，完成了以批判基督教文化、反抗传统理性主义为前提和突出特征的现代转型。

巨大的历史变迁和活跃的社会思潮，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契机和丰厚的土壤。20世纪的欧美文学和艺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裂变，文学和艺术变得似乎面目全非，无法界说了。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深度、历史、主体性的同时，把哲学与非哲学、艺术与非艺术、小说与非小说、高雅与通俗之间的距离也消解了。然而，无论怎样裂变，无论人们对这种裂变有多少种复杂、矛盾的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论是用语言写成的“变异”的文字，用色彩、线条、几何图形构成的“变异”的画面，还是用

泥土、石头、废钢烂铁塑就的“变异”的雕塑，用噪音作材料、以“随机”的方法打破调性原则而创作的“变异”的音乐，都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它蕴含着20世纪人类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识，亦昭示着艺术家们艰难跋涉的心路历程。

二

20世纪特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赋予欧美文学复杂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独特新奇的艺术风貌。

20世纪欧美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哲学、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十分深刻而巨大。以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非理性主义思潮使艺术家们认识到，像传统文学那样，在“摹仿说”的基础上反映、再现的现实，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不是“外于我”而是“我本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向转移”。所谓内向转移，就是由传统文学的向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摹写）转到向内（对心理世界的描述），由传统文学的再现（客体）转到表现（主体）。同时，柏格森的“绵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梦幻”，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主体世界，从而使许多艺术家接受了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关于“意识像一条流动的河流”的观点并力图在创作中加以表现。正是为了用有形的语言描述无形的真实（主观感受），为了在有限的按序排列的时空中显示无限的、流动的、杂乱无序的心理流程与直觉，艺术家们掀起了对文学传统表现形态的变革：情节的淡化和时空错置；叙述视角、场景的迅速转换；语言的变异（语义、语法）等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是一场针对文学传统的革命。这场革命是深刻的，涉及价值观念、美学原则、文艺观和文学表现形态；这场革命亦是全面的，在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歌中，在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戏剧中，在意识流小说中，乃至所有艺术领域，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革命的标记。

二战以后，以海德格尔、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欧美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对二战后欧美文化现象的总体描述，它是探索的、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像传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那样寻求深度模式，它不承认意义因而也不承认深度，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而不可解释也无需解释。人们可以在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提供的符号系统中寻求内在意义；可以在卡夫卡关于城堡、关于人变甲虫的寓言中，在艾略特的“荒原”上感悟

生命的本质，却无法也不必在罗布·格里耶、约翰·巴思的小说世界中追寻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没有意义，没有中心，没有历史，零散而断裂，如此而已。二战以后，在电影、电视带动下大众文化的铺天盖地，又使艺术家们，包括后现代主义者，不得不为自己选择的艺术的生存再次选择。有人继续探索新结构、新形式，以表现适合大众的通俗形式不易或不能表现的，如克劳德·西蒙的小说创作；有人则强调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商业化艺术的融合，如约翰·巴思、让·埃什诺兹等。

20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尖锐、社会革命十分激烈的时代，而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和对文学的评价。一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二战以后，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法、日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处于“冷战”。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1991年以后，苏联东欧巨变，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一切都使20世纪欧美文坛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文学现象，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产生了巨大差异和变化，如苏联的“解冻文学”、“回归文学”；再如对罗曼·罗兰、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的不同评价和争论，等等。

20世纪特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决定了在这一百年中文学的热点问题特别多。几乎每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都会有不同的评价和反应，甚至引起长期争论。当我们深入了解作家们的思想和创作后，就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多样和矛盾，意象主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等派别的划分难以说明他们的丰富与复杂。整个20世纪围绕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从未间断，而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更是充满了矛盾和变数。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对20世纪欧美文学作这样一个描述：整个20世纪的欧美文学与此前的文学相比，称得上是剧烈多变、多元共生、异彩纷呈。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志的传统文学以及继承这个传统而创作的文学，在20世纪仍然广为流传，而且由于它易于与大众文化（商业化文化）结合，其“市场”不断扩展。当然，它也发生了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变化（包括对传统文学重新诠释所带来的变化）。以全面反传统为基本前提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它的创造者尤其是其接受者，始终囿于相对狭小的范围，但是，作为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文学，社会由拒斥到接受，再到奉为经典，最终使之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20世纪的最后20年，又有不少艺术家试图消解这种前沿性，这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又会促成一种新的景观。

三

面对20世纪欧美文坛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应如何看待、持何种态度呢？在这里如果提出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只想提供一点方法论，仅供参考。

首先，应持一种系统的方法。任何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其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系统之中；其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例如，20世纪欧美文坛围绕卡夫卡的《变形记》、奥尼尔的《毛猿》、萨特的《禁闭》等文学作品，展开过激烈争论。我们认为，应将这些文学创作放到20世纪欧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表面上看，人变成大甲虫，人同猩猩联盟，以及人变成幽灵而囚禁于地狱等等，十分荒诞无稽，但却是社会阶级压迫、金钱拜物、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现实的曲折而生动的反映，因而在荒诞中有其合理性，在“非人化”中寄寓着作者人道主义的关怀。再如，苏联“解冻文学”与“回归文学”的出现，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及政策失误的产物，无论是“解冻”，还是“回归”，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又毋庸讳言，这两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有关。

其次，应持一种历史的方法。20世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应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20世纪欧美文学中争论不休的现代主义问题，如果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观点看，的确难以接受，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迥异于传统文学。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其褒贬不一。但我们应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到时代的巨变、人类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巨变，传统的客观摹写的方法难以完全适应人类审美的需要，甚至难以深刻地给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以艺术的表现。对现代主义持完全拒斥的观点，似难成立。历史的观点还指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流派等等，不应孤立地观察，而要将其放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对文学的发展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长期争论不休的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虹》等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人的潜意识与本能欲望的内容，这些作品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孤立地看，表现“潜意识”与“本能欲望”会导致文学离开人类理性的大道，但放到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来看，这种对“潜意识”与“本能欲望”的表现，不仅是对理性社会压抑正常人性的控诉，从而促进人们追求人格的全面发展，而且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开拓了文学表现的新视野。

其三，应持一种求实的方法。这应该是最重要的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

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就拿 20 世纪欧美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来说，就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看到现代主义吸收时代新内容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荒诞怪异的确具有背离逻辑、大众难以接受的一面；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其局限，但在 20 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同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竞争中，也吸取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有价值成分，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

第四，应持美学的方法。文学是人类审美的物化形态，最终又应通过人的审美享受而起作用。因此，美学的方法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毋庸讳言，20 世纪与以前相比，人类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美学的方法也应有所变化，不应固守传统。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美与丑的根本分界应以能否对人产生美感为标准，所谓美感即是对人产生“肯定性的情感评价”。20 世纪欧美文学中，美丑之争十分激烈，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等等，常以丑替美，展现死尸、蛆虫、吸毒、纵欲……等等丑恶现象，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迥异于传统之处，也是其拓宽视野的一种探索。其中许多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尽管描写了社会人生的丑恶现象，但却通过作者的生花之笔最后使读者产生一种弃丑趋美的高尚感情，这正是这些作家作品的成功之处；如果最后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仍是以丑为丑，使读者为之恶心，也许这类作品有其另外的社会意义，但作为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则不复存在。

最后，应持“立足中国，为我所用”的方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洋为中用”。这是我国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 20 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对其进行审视、评价、取舍都应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特别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为出发点，这样，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才会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

关于 20 世纪欧美文学目前已有很多种教材，但都是从史的角度，结合作家作品进行论述。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引起分歧争论的热点的角度来观照 20 世纪欧美文学。首先，这种写法反映了 20 世纪欧美文学的特点。20 世纪欧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一种文学现象未曾引起过争论，因此，这种写法只能大体包括 20 世纪欧美文学重要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有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还未能进行深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考察 20 世纪欧美文学，所谓热点就是对同一文学现象从读者的接受角度进行的不同解读，这不同的解读实际上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再创造，应该成为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围绕某个特定的文学现象，包括流派、作家、作品，将争论的各方面意见一一列出，并表明我们的看法，而我们

的看法也是一种解读。这实际上为广大读者的接受与解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在我国极少有人运用。我们愿作这样的尝试，作为教学，同时也是科研的一种探索。

曾繁仁·

2001.7.20

于济南六里山下

上 编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内容提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围绕西方现代派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倾向，有人反对，有人礼赞。其实，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它从一个层面深化了对人自身及其处境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模仿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纵观这次讨论，可以看出，思想在争鸣中解放，观念在争鸣中更新，文学批评正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步入自由开放的多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西方现代派文学（又称现代主义文学）那光怪陆离的形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进国门的时候，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或肯定或否定，或推崇或批判，沉寂了几十年的文坛着实热闹了起来。其实，现代派文学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以后的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派再也无缘进入国门。70年代末及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年代，中国文艺刚刚挣脱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束缚而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十几年看厌了或看惯了千人一面的文艺表演的人们猛然遭遇现代派的反叛精神，自然会有人惊喜有人愤怒，有人振奋有人惆怅。于是，如何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现代派是艺术创新还是反动颓废？中国是否需要现代派？这些问题带着中国特有的浓烈政治色彩成为文坛讨论的焦点。众多专家学者在难得的宽松环境下各抒己见，一时间中国文苑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关于现代派的争论不仅其争论的内容意义重大，其争论本身也更是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由于人们俗称的“现代派”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流派，它既是一种文艺思潮，又是包括了诸多流派的统称，其中各流派之间在创作原则、美学思想、政治倾向等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关于现代派的内涵也存在许多歧义。目前中国学者对作为文学流派的现代派的界定有两种意见：一派把19世纪末以来以反叛传统、描写异化、表现自我、崇尚非理性主义为特色的区别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统称为现代派（姑且称为广义的现代派）。另一派则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前具有上述特征的诸流派可称为现代派（姑且称为狭义的现代派），二战后已是后现代、后工业社会，诸文学流派虽不乏现代派的某些特点，但其独具的解构性已与现代派不同，故称为后现代主义。仔细辨认一下中国学者在

讨论现代派的价值与性质时所用的概念，即发现众多学者是取前一种含义即广义的现代派。所以，本文所说的“现代派”是泛指性的广义现代派。

由于现代派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讨论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本文仅选择围绕现代派的性质与意义展开的影响较大的几个问题进行评述。

现代派文学的性质与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往往先从政治角度给文学艺术确定阶级属性，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首先遇到的自然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一派学者就主张评价现代派首要的是先定下性质划清几个界限：“在文学的基本性质上，要划清现代派文学同无产阶级文学的界限”；“在文艺思想和美学原则上，要划清现代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界限”等。^①这派学者主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派文学进行批判与否定。

陈慧就曾写过多篇文章对现代派文学进行分析批判。他认为，虽然现代派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有认识意义，其艺术技巧可以借鉴，但“现代派文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西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表现，贯穿于这种文学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文艺观，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陈旧意识。”现代派“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旧文学的范畴，它的基本作用仍然是在维护那陈旧的、阻碍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②

程代熙也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是资产阶级走向腐朽没落时期的产物，它以反理性、荒诞、绝望为其基本特征。”“现代主义作家丧失了对人类本身的信任，不相信人民群众不但能够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造福人类的社会制度。”所以，不管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鞭挞得多么严厉、深刻，“最后的结论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改革不了的，它是会照旧而且永远存在下去的。”对现代派作品及其所承袭的五花八门的唯心主义哲学，必须彻底批判，“决不允许它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由泛滥，造成精神污染。”对其艺术技巧，也不能盲目照搬，“既要开放，又要设防。”^③

陈燊不同意说现代派文学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而应是反映了现

① 陈慧：《必须划清几个界限——谈对现代派的评价问题》，《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陈慧：《必须划清几个界限——谈对现代派的评价问题》，《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③ 程代熙：《拿来主义，还是全盘照搬？——谈怎样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艺》，《红旗》，1984年第6期。

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理由是：客观上，资产阶级不学无术，要使艺术适应自己的需要，对作家或收买或豢养，或提倡有利于他们的统治的文艺流派，或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宣扬悲观、颓废的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等哲学和学说，以毒害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使其自觉不自觉地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效劳。洛克菲勒等资本家促进建立现代艺术馆便是证明。至于有些作品曾为法西斯分子所焚毁，作品遭查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近视”而产生的误会；后来许多现代派作家得诺贝尔奖，遭冷落的作品又热销等便说明了这个道理。主观上，现代派作家虽出身中小资产阶级，但由于他们大多都在个人主义者聚集的巴黎或类似的环境中待过，难免受资产阶级的熏陶和感染。更主要的是其思想核心极端个人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总之，陈燊认为“现代派文学把资产阶级的危机表现为人类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形容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实际上是否定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意义。作品宣扬的人性恶、历史悲观主义等，“都会模糊人们的认识，瓦解人们的斗志，使人们陷于萎靡不振，阻碍他们为改造世界而斗争，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命运”。所以，其认识意义是有限的，离开内容而借鉴其艺术也是难乎其难的，充其量只能借鉴一定技巧。^①

与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不同，陈焜认为，讨论现代派，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他对几个流行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一，我们一向用垂死和灭亡的观点评价现代派，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和灭亡的阶段，现代派当然也是反动和没落的文学。这种“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解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一定要把某种文学的性质同某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等同起来，仿佛垂死和灭亡的时代就只能产生垂死和灭亡的文学，并且用这样的逻辑把现代派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在文艺理论上包含的观点是很不恰当的。”何况关于资本主义何时灭亡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事情。其二，把垄断资产阶级走狗的罪名加给现代派也是站不住脚的。现代派不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和垂死挣扎的表现，而是它的危机的产物；现代派不是帝国主义政策在文学上的工具，也不是在危机中维护旧势力的派别，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的反映，是对帝国主义政策发出的反响。^②

与现代派文学的性质相联系的是现代派文学的思想特征。现代派文学是否是颓废文学？如何看待现代派文学对“危机意识”、“人性恶”的描写？学者们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

陈慧认为，现代派文学生而有之的最明显、最普遍、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就

① 陈燊：《也谈现代派文学》，《文艺报》，1983年第9期。

② 陈焜：《讨论现代派，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是颓废性。理由有三：其一，现代派的世界观是一种“危机宗教”，且大部分都是膜拜魔鬼的宗教，如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存在主义的“荒诞”等，都是取代上帝的魔鬼。其二，现代派的历史观是“非人性化”。“非人性化”用性恶论代替性善论，宣扬历史悲观主义和对人类的绝望感，“麻痹人们的斗志和勇气，放弃去积极寻求出路的努力”，这“反映了这个阶级从一个充满信心的上升阶级已蜕变为没有前途的趋于没落的阶级”。其三，现代派的伦理观是“非道德化”，美学观是“反向诗学”。“非道德化”在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进行抗议的同时，往往伴之以野蛮地否定人类生活的伦理准则，且往往用道德批判代替社会批判，不主张用“政治暴力”，便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现存制度的作用。“反向诗学”着重地或专门地以丑、恶、罪、灾难、危机、死亡及一切阴暗污秽的东西为审美对象，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审美领域，但也导致了对美学准则和艺术自身的亵渎和否定。因此，评价现代派文学若忽视或无视其颓废性，便是漠视或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纯文学研究，是资产阶级艺术观。我们“必须坚决同其颓废意识划清界限，决不能听任这些毒素渗透进来……损害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①

陈焜则认为，现代派的中心是危机意识及其与之相联的异化观念。危机和异化都表明资产阶级阵营中一部分最敏感的人士已经对现代社会形成了较少幻想的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各种传统观念所包含的千年王国的福音是一种现实的思想，要求对世界和人的真实取得新的认识，并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处境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这与那种还在追求过时的观念的意识相比，当然是一种明显进步；和19世纪的文学一样，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自我批判。“因此，危机和异化的意识恐怕不是颓废和堕落，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自身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是人对他所面临的矛盾有了新的了解的结果。”再者，用永恒的标准衡量文学，认为表现积极向上的情绪，描写真善美对假丑恶的胜利才是好文学，否则便是坏文学，并以此为标准指责现代派指不出正确的革命出路、违背了真善美的理想，这也是不恰当的。他指出，“一个时代只能得到它的历史内容允许它得到的文学。”要文学服从自己主观的要求，结果绝不会创造出真实的善和美，只能把文学变成虚假的东西。而指出革命出路就更不是简单的事情了。作家也没必要必须成为革命导师。现代派从反面提出了希望人的本质得到无限发展的理想，虽然提不出具有肯定形式的思想，但很可能是为一种更高的意识的出现铺平道路。^②现代派对传统的现实、本质、真善

^① 陈慧：《论西方现代派的颓废性》，《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② 陈焜：《讨论现代派，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美观念等提出质疑，强调人的主观感觉，文学观念更加复杂，一般地说，这不是歪曲否定而是更加接近了生活真实。^①

李文俊说，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水平，应以代表其文化成就的优秀作品为依据。西方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派都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其悲观主义是社会本身不让人乐观。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反动颓废的。真正鼓吹压迫有理、剥削有功，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大作家，直到现在为止还很难找出一个。有些人看不惯西方现代文学，恐怕是由于不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②

黄嘉德同样反对把西方现代派文学统统斥为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而一笔抹杀。他说，《尤利西斯》、《荒原》等许多作品早就被西方视为经典之作而载入史册，就说明了我们必须排除偏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作家作品。^③

王文彬也认为，对反映资本主义危机的现代派文学，长期采取不屑一顾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是由于习惯于欣赏写工人失业贫困、斗争，写资本家荒淫奢侈的生活，这是一种固定的成见。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早就有了改变。^④

袁可嘉主张对现代派文学采取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他说，现代派文学是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腐朽造成的异化、两次世界大战、反理性主义思潮等是现代派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西方现代派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但它既不是垄断资本的卫士，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先锋，而是中小资产阶级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的喉舌。现代派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两重性：既揭露社会矛盾又散布错误思想；艺术上既有创新又有破坏。现代派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对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深切危机感；它描写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异化，表现了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和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其强调心理真实、重表现、重语言形式的艺术观及表现手法与其内容相辅相成，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⑤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单纯从政治着眼，用阶级定性的方法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确简单易行，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宣言，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很难纳入非黑即白的阶级壁垒之中。如有的学者把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阶级分类，认为尤金·奥尼尔《毛猿》中的杨克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无所归属，“正反映

① 陈焜：《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春风译丛》，1981年第4期。

② 李文俊：《依据什么来衡量西方现代文学》，《文史哲》，1980年第3期。

③ 黄嘉德：《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文史哲》，1980年第3期。

④ 王文彬：《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文史哲》，1980年第3期。

⑤ 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